

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陈玉玲

(丽水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高等教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政策由严格变为宽松成为导致1921—1927年期间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政策对1958—1960年高等教育“大跃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校扩招等政策成为推动2000—2010年期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直接因素。通过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分析可知,高等教育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政治、经济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等。为了更好推动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政策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兼顾社会工具价值取向与人本理性价值取向,另还要加强高等教育立法等。

关键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三次飞跃发展;高等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7)02-0073-07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7.02.013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至今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三次飞跃发展,即1921—1927年高等教育“大发展”、1958—1960年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及2000—201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政策是影响这三次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下面将对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探究。

一、高等教育政策变宽松:1921—1927年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20年代,全国大学校数、高校学生数都迅速增加,如表1所示:

表1 1916—1926年期间部分年段全国高校数及其学生数统计表

年别 (年)	校数(所)				学生数(含大学、专科及专修科生)(人)		
	合计	大学		专门学校		在校生	毕业生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1916	86	3	7	55	21	17 241	1 470
1917	—	3	7				1 155
1920	86	3	7	59	17		1 446
1921	—	5	8				1 428
1922		10	9				1 742
1923		19	10				2 005
1924		30	11				2 397
1925	105	34	13	42	16	36 321	2 272
1926		37	14				2 841

收稿日期:2016-10-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14YJC880007)

作者简介:陈玉玲(1983—),女,四川广安人,教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资料来源: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 教育统计),文海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页;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丙编:教育概况(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14-15、22-23页;吴相湘、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册)丁编:教育统计,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第30-31页;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七编 高等教育),正中书局,1957年出版,第445页。

由表1可知,在1921—1926年期间公私立大学数由13所增加到了51所,增加了3倍;学生在校数和毕业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如1925年在校生数是1916年的2倍多,1926年的毕业生数是1921年的近2倍。大学数量增加与专门学校升格以及私立大学纷纷设立相关联。据部分统计,1923年、1924年分别至少有5所、9所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如湖北的法政专门学校升格为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武昌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等^{[1](P15)}。有关各类私立大学设立情形,据部分统计,北京于1924年前增设了平民大学、华北大学、新华大学、神州大学、新民大学、郁文大学等约10所私立大学,1924年之后又创办了公民大学、国际大学、畿辅大学、进羣大学、东亚大学、人文大学、东方大学等至少13所私立大学^[2]。上海的私立大学也增加迅速,此不一一列举。总之,1921—1927年期间“大学热”现象盛行,高校规模扩张,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大发展”堪称“五十年来的高原期”^[3],但教育质量日益低下等诸多问题也伴随而生^①。

高等教育政策的变更是导致该历史阶段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条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4](P108)}如此严格限定的法令使得国内高等院校数量相对稳定。如表1所示,在1917年之前公私立大学总数均不超过10所。但自1922年始公私立大学总数迅速增加,共19所,1923年29所,到1926年则共有51所。

这一阶段公私立大学迅速成倍增加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17年9月北洋政府颁布的《修正大学令》,该政策完全改变了民初《大学令》中对大学设置的严格要求,规定“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4](P168)}。其“但设一科”的规定,为各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放宽了大学创设的条件,也成为当时大学滥设的重要源头。1922年北洋政府颁行的《壬戌学制》进一步延续了《修正大学令》的相关规定,如“专门学校如提高程度”得改为单科大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如提高程度”得改为师范大学校^{[4](P86)}等规定则进一步推动了大学升格运动。而且,该法令对私立高校的快速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最终引发了高等教育“大发展”。正是自1922年起,私立高校数和学生数明显增加。总之,“自新学制公布以后,因限制较宽,全国大学骤然增加”^{[1](P15)}。192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要求“国立大学校得设数科或单设一科”^{[4](P174)}。“单设一科”的规定表明政府仍在鼓励各地兴办大学,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大学热”。由此,民初以来高等教育政策由严格变为宽松,尤其是大学可“单设一科”的规定成为导致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高校数量急剧增加、大学滥设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政策:推动1958—1960年高等教育“大跃进”

1958—1960年期间,全国高校骤然增多,学生数大幅度上升。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指出,1958年高校学生增加了22万人,增长50%^[5]。而且,据不完全统计,在1958年4月至5月底期间,江苏、广东、吉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甘肃、湖北、山西、北京等17个省市新建大学与专科学校多达130多所,“成为我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举’”^[6]。这一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表2 1957—1965年期间全国高等院校数及其学生数统计表

年别 (年)	校 数(所)			学 生 数(人)			
	合计	综合大学	院校	在 校 生			毕 业 生 本、专科生
				合 计	本 科 生	专 科 生	
1957	229	17	212	441 181	393 329	47 852	56 180
1958	791	27	764	659 627	518 767	140 860	72 424
1959	841	29	812	811 947	660 373	151 574	69 839
1960	1 289	37	1 252	961 623	774 515	187 108	136 138
1961	845	32	813	947 166	807 881	139 285	151 283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65—972页。

由表 2 所知,全国高校数由 1957 年的 229 校骤增至 1960 年的 1 289 校,增加了近 5 倍;在校生由 1957 年的 441 181 人增至 1960 年的 961 623 人,增加了 1 倍之多,毕业生亦快速增多。而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还兴办了很多不正规的业余学校。以河南省为例,登封县委发出“全县办大学”号召两天后全县就办起了 44 所“红专大学”,入学人数 11.7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3 以上^{[7](P292)};遂平县 10 个基层公社共兴办 570 余所高校,学员达 10 万多人^{[7](P292-293)},等等。这类学校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大学,其教学程度和教育质量都较低。当然,该阶段除新办大学外亦有大学升格运动,即“戴帽”。据透露,当时“15 个高等学校中,其中 10 个是戴帽子戴起来的”^{[8](P1014)}。另外,一些原有高校大量增加学生,致使 1958 年之后高校规模也迅速扩大。总之,该历史阶段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第二次飞跃发展,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

“普及高等教育”、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等政策对这一历史时期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 1954 年 10 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便在《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发展还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正本着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一面积极创造条件,一面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潜力,完成国家培养干部的计划”^{[8](P391)}。该文为后来革命式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埋下了伏笔。1958 年 4 月,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针对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普及教育”的指示提出了“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想法^{[8](P824-825)}。同年 9 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达到普及高等教育的目的^{[8](P860-861)}。由此,“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政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出台,致使全国各地大兴创办大学之风。同年 4 月的《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

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与 8 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主张,下放教育管理权限,要求除少数综合大学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教育部或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余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9],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教育“大跃进”提供了保障。总之,在上述“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等政策的引导下,高等教育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完全不顾条件,不讲质量,一哄而起”^{[7](P291-292)}。而且,全国下放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苏联单一体制的僵化模式,有助于改善高等教育管理权利过于集中的状态,扩大地方政府办学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形成了全民办学的热潮。然而,一方面因中央对权力下放缺乏宏观上的统筹规划和调控,另一方面因地方省份也缺少管理高等教育的实际经验,结果致使地方办学的灵活性变成了盲目性。再加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放教育管理权遂演变成了放任自流,全国上下都试图在短时期内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追求小而全,由此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无序增长,也致使其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和教育系统本身的承载能力。最终,原本具有探索性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沦为了是一场盲目的政治运动,高等教育陷入混乱发展状态,甚至成为了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场“闹剧”。可见,“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与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等政策对这一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大跃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高校扩招政策:推动 2000—2010 年期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直接因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点,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发展契机。特别是 1999 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决定后,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迎来了第三次飞跃发展时期,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1978—2010 年期间部分年段全国高等院校数及其学生数统计表

年别 (年)	校 数(所)			学 生 数(人)			
	合计	大学、学院	专科学校	在 校 生			毕 业 生
				合 计	本科生	专科生	本、专科生
1978	598			856 322	458 548	379 586	164 581
1985	1 016	573	325	1 703 115	1 122 643	580 472	316 384
1990	1 075	620	341	2 062 695	1 320 124	742 571	613 614
1991	1 075	620	341	2 043 662	1 320 004	723 658	614 267
1995	1 054	616	352	2 906 429	1 638 200	1 268 229	805 397
2000	1 041	599	442	5 560 900	3 400 181	2 160 719	949 767
2001	1 225	597	628	7 190 658	4 243 744	2 946 914	1 036 323
2005	1 792	701	1 091	15 617 767	8 488 188	7 129 579	3 067 956
2006	1 867	720	1 147	17 388 441	9 433 395	7 955 046	3 774 708
2009	2 305	1 412	1 215	26 860 083	14 055 173	12 804 910	7 254 916
2010	2 358	1 112	1 246	27 678 317	14 906 589	12 771 728	7 727 118

注：上述高校总数包括短期职业大学、高等职业学校或职业技术学院等，如 1985 年总校数中有 118 所短期职业大学，1990 年有 114 所，1995 年有 86 所，2000 年和 2005 年的职业技术学院分别为 184 所、921 所，2006 年有高等职业学校 981 所。

资料来源：据各年《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编制而成。如《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年出版，第 965—972 页；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著：《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第 24—29 页；《201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203/132634.html。

据表 3 所知，高校数量在 1978—1990 年期间持续上升，1991—2000 年期间因高校合并稍有减少^②；在校生数亦呈持续增长态势，如 1978 年在校生有 856 322 人，到 1985 年则有 1 703 115 人，增加了近 1 倍。事实上，1978—1995 年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基本相适应^{[10](P224-225)}，但 1999 年之后情况则发生了改变，我国高等教育每年均以 17.8% 左右的速度扩大招生，高校数、在校生数以及毕业生数都迅猛增加。如 2001 年高校数是 1978 年的 2 倍有余，2010 年高校数几乎是 1978 年的近 4 倍；2000 年在校生为 5 560 900 人，是 15 年前的 3 倍之多，其毕业生数亦是如此。与此同时，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亦扩大，如 1999 年全国高校毛入学率为 10.5%，2000 年为 11.5%，2001 年为 13.3%，2002 年已达 15%，2005 年达到 21%，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11](P211)}。到 2007 年毛入学率已达 23%，全国已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12]。可见，在 2000—2010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即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发展，但高等教育质量与数量之间矛盾也日益突出。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确定与自 1999 年以来的高校扩招政策，成为影响该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后者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1982 年 9 月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二大)首次将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13](P7)}。党的十三大将教育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党的十四大则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4](P30-31)}。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巩固和确立，也使得高等教育被置于重要位置，其快速发展势在必行。但 1999 年之前高等教育规模基本趋于稳定，因为当时的高等教育政策如国家教委于 1992 年 1 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93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都要求稳定高等教育现有规模^[15]。但至 1998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政策中断了对以往的政策延续，在指导思想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基本稳定’飞越到了‘积极发展’”^[16]。如当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 1999 年 1 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促使高等教育规模较大发展^{[17](P638-639)}。1999 年以来高校扩招政策则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如 1999 年 6 月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决议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再如同月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指出，要“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18](P287)}等等。正因这些政策的引导，高等教育自 2000 年始迅猛发展(如表 3 所示)。一些高校又

开始纷纷升格:高等职业学校想升成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学校想升为学院,学院则千方百计想升格为综合性大学,普通大学又想升为重点大学等。如我国1998—2003年期间新增的114所本科院校均为“专升本”,平均每年增加23所左右^[19]。再如湖南省于2010年就有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升为湖南女子学院)、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升为湖南财经经济学院)、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升为湖南警察学院)等3校升格。由此,盲目追求高层次、“综合化”以及新一轮“大而全”的办学浪潮席卷而来。总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确定以及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政策翻开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但同时也面临着教育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

四、余论

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期间,虽然高等教育在短时期内迅猛发展,但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出。而高等教育三次飞跃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政策的引导和推动:20世纪20年代“大学热”现象盛行与高等教育“大发展”是1917年始高等教育政策变得更为宽松导致的结果;高等教育“大跃进”是当时“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下放高等教育管理权等政策引导使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则是因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的。可见,高等教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下面将对这些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探讨。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高等教育政策,必然受到国家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环境、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代表的集团利益与政局的稳定情况也对其产生一定作用。高等教育“大发展”期间,因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政局,致使北洋政府无暇顾及高等教育。当时宽松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单科大学”的设置还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弥漫着的“科学救国”等思想相关联。在当时逐渐倾斜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社会背景下,北洋政府原意是打开单科的应用型技术类大学的大门,降低这类大学的开设门槛,以满足社会对科学的追求,但因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缺失,没有出台相应的高等教育监督和基准制度,导致了当时“大学热”以及高校滥设现象盛行。高等教育“大跃进”完全受到了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使得“十五年普

及高等教育”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注脚,以满足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其结果是盲目扩张高等教育的规模,给高等教育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得隐性,经济体制以及“技术—经济意识形态”^③对其影响更为明显。因为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出台的 direct 动因便是迎合拉动国内经济发展之需,由此,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技术—经济意识形态”的注脚,以满足提升社会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需求,并成为特定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但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张过程中渐渐忽略和超越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给高等教育及社会都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而言,影响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是以政治价值取向为主导的。北洋政府时期调整和修订后变得更为宽松的高等教育政策有着适应“科学救国”的社会需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但因当时政局混乱,社会不安定,通过教育、科学来振兴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政治愿望也给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创设了机会。影响高等教育“大跃进”的高等教育政策仍是以政治价值取向为主导,其原因一,是当时要求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使高等教育“大跃进”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原因二,“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响应毛泽东试图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步伐的号召,快速发展国民经济,“赶超英美”,最终突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校扩招等政策最初基本上以经济价值取向为主导。除了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素外,高校扩招政策出台的 direct 原因便是为了促进国民消费教育,并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时的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逐步二元化:除了关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也开始关注学生素质的培养。如前文提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表明,在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同时要求“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主张“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18](P286-287)}。再如2001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也提出了“教育的培养目标旨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大量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的规定^[20]。可见,这时高等教育政策除了要适应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需要,

也开始关注到人的发展需求,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成为其关注的侧重点。因此,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也开始趋向于“以人为本”,只是其个人价值取向仍相当薄弱。实际上,鉴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2006年开始便极力控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并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促进受教育者各方面发展置于关键位置,强调走内涵式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自此,高等教育政策不再仅仅是满足或迎合政治或经济的需求,而是将人自身的需求及其充分完善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政策的首要价值目标,基本上呈现出了以人本理性价值取向为主导的趋势。总体来讲,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多强调政治或经济的价值取向,以社会工具价值取向为导向,强调“社会本位”和服务于社会,而人本价值取向较为弱化,即忽视了“以人为本”的人本理性价值、弱化了服务于人的教育发展方向。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单一的社会工具价值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政策可能会导致高等教育违背自身发展规律而盲目发展,因此,高等教育政策应该兼顾社会工具和人本理性的二元化的价值取向,所幸的是,目前高等教育政策正努力实现价值取向的转变和兼顾。

另外,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飞跃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多是以北洋政府教育部法令的形式得以颁布,并没有经过国会立法程序以颁布国家高等教育立法,致使其在执行过程中得不到其他部门的支持。高等教育政策层次不高,再加上北洋政府对其缺乏监督管理,这是致使当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教育质量日趋低下的重要原因。高等教育“大跃进”多是在中央政府的“指示”、“通知”及“草案”下推动起来的,这一时期的“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等政策的表述也明显带有政治口号化的倾向。正如有人指出:“1958年的教育改革主要是依靠发

布文件、社论和通知等行政的方式,大搞群众运动,”^[21]从而致使高等教育倒退。而高校扩招政策出台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迎合国内经济发展的一时之需,其主观随意性明显。前两次高等教育飞跃发展明显是在高等教育政策缺乏法律保障和监督的情形下出现的,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完全打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甚至对其进行了全盘否定,这种盲目冒进、极端随意性做法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出台时,《高等教育法》也才颁布不久,以致于其也没有很好地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上述历史经验表明,需要加强高等教育立法,形成一个形式完整统一、层次排列有序且程序严格规范的高等教育法规体系,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当然,还应完善法令监管机制以增强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度。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政策成为影响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三次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但须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否则便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在特定历史阶段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单一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社会工具价值取向朝着兼具人本理性价值取向的二元化转变。高等教育三次飞跃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单一价值取向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会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一定问题,因此,高等教育政策应同时兼顾社会工具价值取向和人本理性价值取向。另外,还应加强高等教育立法,并完善法令监管机制,以加强对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最终,高等教育政策应从注重外延式的发展、规模的扩张转变为与注重内涵式建设、质量的提升兼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试图进行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双重奏。

注释:

- ① 有关当时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参见陈玉玲、田正平:《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基于时人视野的考察》,《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1期,第74—80页。
- ② 如1991年参与合并的72所高校并为23校,2000年参与合并的231校并为91校。参见《1990年以来高校合并情况(截止

2006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80/201005/88440.html。

- ③ 参见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8—83页。

参考文献:

[1] 吴相湘,刘绍唐.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册)丙编:教育概况(上)[Z].台北:传记文学出版

社,1971.

[2] 陈玉玲,田正平.20世纪20至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

- 题——基于时人视野的考察[J]. 现代大学教育, 2012(1): 77.
- [3] 徐则敏. 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J]. 中华教育界, 1931(1): 79—80.
-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教育[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5] 杨秀峰. 我国教育事业的大革命和大发展[J]. 人民教育, 1959(11): 8.
- [6] 我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创举地方和群众大办高等学校[N]. 人民日报, 1958-06-13(1).
- [7] 李锐. 李锐文集(卷三)“大跃进亲历记”下[M].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 [8]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58(26): 570—572.
- [10] 黄忠敬, 李晓军. 上大学, 离我们还远吗: 审视高校扩招[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 [11] 刘海峰, 史静寰. 高等教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12] 刘道玉.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N]. 南方周末, 2009-02-26(E31).
-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15] 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J]. 国家教育委员会政报, 1992(3): 1—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N]. 人民日报, 1993-02-27(1).
- [16] 彭红玉, 张应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政策文本与实施效果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7, 28(6): 33.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8(22): 8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8]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8—2002)[Z].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
- [19] 唐景莉. 专科学校升格要不要降温[N]. 中国教育报, 2003-12-24(1).
- [20] 教育部. 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N]. 中国教育报, 2001-10-15(5).
- [21] 杨孔炽, 任钟印. 中苏美 1958 年教育改革的回顾与比较[J]. 教育研究与实验, 1988(2): 27.

The three developments i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HEN Yu-li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Lishui College, Lishui, Zhejiang 323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that influence the three developments in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become loose from strict from 1921 to 1927.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within 15 years with great leap forward” is advocated from 1958—1960. The enrollment expansion of universities acts as a driv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2000 to 2010.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a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values as well.

Key words: centennial histor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ree developments; history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姜惠莉]